

國父之逝世與遺囑

朱 諶

壹、國父之遺囑

一、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二日爲 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三秩晉二誕生紀念日，早晨六時，中國廣播公司新聞廣播網播出一則消息，敘述發現未見流傳之第二份 國父遺囑。按史料所見 國父留有二份遺囑：一份爲 國父留給國人公衆之遺囑；一份爲 國父留給其家人之遺囑。如今傳出發現第三份「遺囑」，而且與當時所謂「聯俄容共」政策相關，對於研究三民主義之學者，當然是一件大事。因此當天上午翻遍各大小報紙，細閱各版新聞，但是都找不到中廣新聞網所播報之新聞，於是，不得已打電話查詢消息來源，據告該則消息來自中廣高雄台，並且承蒙熱心協助，電話轉往高雄台查詢，最後獲得回音，告知這份史料珍藏在高雄縣旗山慶大德美術館。進一步查詢，所獲資訊，據告知該史料長寬爲七十公分與五十公分，原印製一百二十五份，印竣散發後，立即下令收回一百十九份，尚有六分留傳在外等語。

爲此史料，特函託學隸楊順富由鳳山專程前往旗山拜訪慶大德美術館主人郭三平先生，承其慨允，由楊君借用用A3紙張分段影印，然後連接成件，以現原貌；獲得該項史料，真是如獲至寶，對於郭三平先生表示最高敬意。

二、高雄慶大德美術館珍藏之史料，全幅長七十公分，寬五十公分，頂端自右至左橫寫「孫中山先生遺像」七字，橫批之下，有國旗與中國國民黨黨旗交叉而置，旗下爲 國父遺像，飾以花絮，呈腰圓

形。遺像之下，以花邊框飾，列印二份遺囑，框外右邊直印「遺囑」二字，框外左邊直印「原稿」二字。框內列印遺囑二份。第一份為留給國人公衆之遺囑，文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該遺囑係由汪精衛手筆所寫，沒有標點符號，遺囑之末，國父簽具「孫文」二字。國父簽名之右下方有「三月十一日補簽」字樣，應屬汪精衛之筆蹟。遺囑日期列明為「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日期之後，有「筆記者」「汪精衛」之簽名，「證明者」按簽名序有：宋子文、孫科、邵元沖、戴恩賽、吳敬恆、何香凝、戴季陶、鄒魯等九人。

花邊框內之第二份遺囑係國父留給家人之遺囑，文曰：「余因畫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成長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由汪精衛執筆沒有標點符號，遺囑簽具「孫文」二字，右下方有「三月十一日補簽」字樣。遺囑日期列明為「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筆記者」有「汪精衛」簽名；「證明者」，依簽名序有何香凝、宋子文、鄒魯、吳敬恆、孫科、邵元沖、戴季陶、戴恩賽等九人。

所謂第三份遺囑，以花邊框飾，用印刷正楷體排印，題為「致蘇俄書」，置於史料之底層，文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志，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中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

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文後印「孫逸仙」「簽字」字樣，而無「國父親手簽名」。

三、這份史料中央爲「國父遺像，呈腰圓形花絮飾邊，遺像左右兩旁，排印「孫先生事略」，文曰：「先生諱文字逸仙，別號中山粵之香山人也，少時，卒業香港醫學。先生留學生時代，痛列強之侵掠，國內政治之腐敗，非推倒滿清不能救亡。遂誓志革命，聯絡同志，光緒中葉在澳組織興中會是爲先生從事政治革命之始，越二年，中日戰起，先生憫清吏之不備，起事廣州，卒以謀洩密失敗，次年抵英，爲清吏誘禁，幸事洩獲免，旋渡扶桑，深結同志圖再舉；庚子之變，復起於惠，不幸援餉不濟事復失敗，未幾，與黃興輩合組同盟會，嗣後起事於粵滇湘皖，履遭顛蹶，然志不稍餒，卒以辛亥之役告厥成功，乃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元年春爲南北統一計讓位於袁世凱，旋任全國鐵路督辦，二年討袁失敗，東渡日本，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任總理，六年護法軍興，推先生爲大元帥十年非常國會復推先生爲大總統率師北伐，卒以軍需不濟，重返廣州。十一年，陳炯明叛，蒙塵海上，及陳潰逃、乃復入粵就大元帥職，十三年改組中國國民黨，發佈宣言及黨綱、主力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同一年秋，討賄選功成，扶病入都，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事，發表對時局宣言，不幸二豎爲祟，沉痾莫起於本年三月十二日辰刻，竟不克見國民會議之實現、而資志以終吁可傷已先生享年六十，遺體用玻璃棺殮，安葬於南京紫金山，雖百十年後，猶可仰瞻先生之遺容也。十四年四月誌」。

依據「事略」文末所記載之日期，似可推測該史料應爲十四年四月印製。

四、這份史料左側花邊框內印有：「先生之民族主義，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取消國際間一切不平等條約」。右側花邊框內印有：「先生之民權主義，是國內被壓迫民衆親密團結起來，推翻殘民之軍閥，建設真正民主國家」。下層，「致蘇俄書」之上，則花邊框內橫印自左至右有：「先生之民生主義不外二者（一）平均地權（二）節制資本」。

五、這份史料的焦點是「致蘇俄書」，對照其他二份遺囑，具有甚大差別。「致蘇俄書」有四項特色：

第一、全文是以工整毛筆正楷書寫，每行九字，共四十八行，且有標點符號。不同於其他二份遺囑，沒有標點符號。

第二、文句採用白話文，不同於其他二份遺囑，文句洗鍊。

第三、文末沒有「國父親筆簽名，僅排印「孫逸仙」「簽字」字樣，不同於其他二份遺囑，都有親手簽名。

第四、沒有「筆記者」及「證明者」之簽名。

揆諸上述四點，「致蘇俄書」之源出令人置疑。尤其黃昌穀先生記述「國父患病逝世之詳情，演講中說明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撰寫遺囑經過，明確記述只有二份，至於「致蘇俄書」之來源出處，似應考証其他資料，以驗証其真偽。

貳、國父之逝世

民國七十八年，私立樹德工業專科學校校長林寶樹先生將珍藏之上海民智書局印行出版之革命先進黃昌穀先生演講，書名「孫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詳情」一冊，複印一份，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楊基榮先生帶來本所，斯時，余承乏所長之職，遂將該演講全文刊印於「三民主義學報第十三期」。

林校長熱心興學，是一位教育家，將珍藏多年史料孤本複印公之於世，供後學者研究，其心善哉，其意偉哉！如今據聞林校長已經仙逝，仍在此表達紀念感崇之意。

今因有「致蘇俄書」是否屬於 國父之第三份遺囑的疑問有待考証，而黃昌毅先生追隨 國父左右，民國十三年， 國父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擔任記錄；黃氏復追隨 國父北上，記述沿途見聞，最具史料真實性，爲了印証前述「致蘇俄書」，特再將黃昌毅先生演講全文刊印於本學報，以供研究。

黃昌毅先生演講全文，上海民智書局印行出版，書名爲「孫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詳情」，內頁文前標題爲「大元帥北上患病逝世以來之詳情」。

黃氏演講中，曾詳細描述汪精衛代筆撰述「遺囑」與國父之對話及簽署遺囑的詳情，文中都只表達只有二份遺囑。

黃氏演講中，特別引述 國父臨終諄諄叮囑之詞：「我這次放棄兩廣來北京，是謀和平統一的，我所主張統一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義和五權憲法，建設一個新國家。……我很希望各位同志努力奮鬥，達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然是死了，也很瞑目了。」

黃氏特別說 國父在說完上面那一段話後，「從此以後呼吸更極艱難，精神疲倦，不能連續明說四五十個字以上的話，只有不連不斷的反覆說「和平」「奮鬥」「救中國」。

黃昌毅先生演講詞

前大本營會計司長黃昌毅，隨同大元帥北上，爲國民革命奮鬥，待大元帥喪完竣後，黃君即返省，四月三十日代表胡留守參與澳軍幹部學校第二次畢業典禮，黃君演說大元帥北上患病逝世詳情，約有一小時之久，茲將黃君演說詞全文誌述如下，以供國民之參閱、演詞云：大元帥因謀全國和平統一，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離開廣州北上，十七日上午到上海，因爲所坐的春陽丸走得不大平穩，又遇風浪，所以

同行的人多是暈船，就是大元帥恐怕也是不大舒服，大元帥在春陽丸中，除了十三日初由香港上船的那一夜，曾經上過大餐廳，進晚餐一次以後，都沒有出臥室一步，都是在臥室中休息。十七日清晨到吳淞口，我看見大元帥的面容，就覺得不大好，頗見黑暗蒼老之象。一到吳淞口，上船來歡迎的人數，固然是不大多，大元帥接待也不大煩雜。但是另外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就上前告說：「昨天上海字林西報有一篇短論文，大意是討論孫先生到滬居住問題的。因為孫先生是現在廣州大本營的大元帥，一舉一動，當然是負得有政治上的任務。在上海租界之內，完全是商務的性質。負有政治任務的大元帥，到這個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來居住，是否相宜，似乎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大家應該要研究的。」就這篇論文的命意，自然是挑撥上海各國人民的感情，來反對大元帥在上海登岸久住。大元帥聆了這個報告之後，便正色對那位日本新聞記者說：「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根本上還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要做甚麼行動，當然可以做甚麼行動。他們客人決計是不能夠干涉的。……」說了這些話以後，感情上似乎有一些不大愉快。又經過船上那幾日的勞動。所以一到上海以後，所照的像片，便極表現蒼老的樣子。照兄弟觀察起來，大元帥歷年在肝上的癆病，當那天初抵上海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現。不過到了上海以後，調養得宜，所以還能夠抵抗。所以十八日以後還能夠見北京天津各界所派來歡迎的代表，並且調查往天津的船期。在十九日開了一個茶話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在本國宣佈政見。說明這次北上的主張是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內人民生活問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兩件大事。及十九日下午，知道了由上海直往天津，在兩個禮拜以內，都沒有船位。而北方歡迎的代表又是催促很急。所以同時又調查繞道日本到天津的船期。

那天晚間，知道了在十日之內，由上海繞道日本，可有船到達天津。便立時決定由上海繞道日本往天津的路程，大元帥的意思，以為到了日本以後，還可以借候船的機會，在日本去宣傳對於時局之主張。同時也可以會晤日本的舊朋友，和徵求日本國民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主張，究竟是一種甚麼意

見，和一種甚麼態度。我們由上海起程的那一日，是十一月二十一日。所坐的船是上海丸。那隻船走得還平穩，風浪也不很大，大元帥沒有甚麼辛苦。所以二十三日一到長崎，精神也是很好，就對那些來歡迎的日本新聞記者和政學各界，說明這次繞道日本的原因，和這次往北京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又對中國在長崎的留學生演說中國留學生應該要提倡國民會議，來解決中國的內亂，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次講話，大約有一點多鐘。我們這次到長崎，因為船沒有泊碼頭，大元帥沒有上岸。上船來歡迎的中國和日本人士，不見得很多，大概只有三四百人。不過那些人都是日本極有智識的階級，他們一上船來，便可見他們的態度都是很熱心又很誠意的樣子。當晚由長崎開船，二十四日下午就到了神戶。離碼頭還有很遠的時候，我們便遙見站在碼頭上來歡迎的中日人士，像堆積成山一樣，及近碼頭，聽見學生的鼓樂之聲喧天，更是熱鬧的很。

估計當時歡迎的人數，總有四五千人以上。大元帥就在上海丸中，接見那些來歡迎的歐美日本和中國諸重要人員。一接見之後，神戶附近各市區像東京大阪的新聞記者，便組織了一個臨時團體。那個臨時組織的團體，總有一二百人，要在船上請大元帥宣佈對於中國時局的政見。大元帥答覆的意思，大概和在長崎所講的話，沒有大分別。不過有許多新聞記者，像東京朝日新聞的中國部長那種人們，更用極誠懇的態度發言，來請教大元帥對於要能夠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是用一種甚麼具體的方法。他們的理由，以為那些條約都是有歷史上權利關係的根據，如果要外國馬上就拋棄在中國的權利，廢除那些條約，在事實上恐怕不容易辦到。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就和大元帥詳細討論大元帥的答話，是說那些不平等條約，固然有歷史上權利關係的根據，但是那些條約的根本原理，就太不公平。而且現在不廢除那些條約，將來中國國民覺悟了，知道太不公平，一定是很恨外國人的。到了中國人發生恨外國人的心理，在消極一方面，便可以抵制外國人，不買外國的進口貨，不用外國的紙幣。外國人因此失了中國國民的感情，在商務一方面，損失是很大的。至於利用那些不平等條約，在中國雖然可以收關稅，得賠償和

強借外債，但是所得到的利益還是很小的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現在那些條約之所以不能廢除的道理，就是由於在外國的主張公道的那般國民，不知道這種利害輕重的關係和條約中之所以不公平的道理。假若他們真是知道了這種道理，我們中國用極公平的理由，和他們的政府同國民交涉，一定是可以廢除的。大元帥對於那一團日本新聞記者講完話以後，還有許多英美新聞記者，也來要求宣佈政見。大元帥因為他所反對的根本道理，就是帝國主義，所以便不情願和他們講話了。就離開上海丸，搬到東方旅館了。到了旅館之後，大元帥又接見了幾位來賓，大概都是很熟的朋友，當日所講的話不多，也不情願多見客。祇是注意日本全國的輿論，對於他在長崎所發的政見，是一些甚麼批評。所以就索閱本日的各種新聞紙。知道了各報的記載，都是歡迎的態度，善意的批評，便極表示愉快，毫不現旅行疲倦的樣子。二十五日起，在神戶候船，一共有五個日期。除二十八日下午，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公開講演『大亞洲主義』。及二十八日晚，在東方旅店之各團體歡迎宴會上演說『日本國民應該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以外。其餘從朝至暮，都是用極誠懇的態度和言語，向日本各界人士，單獨的說明處於現在各種民族競爭之際，中國同日本非親善不可。想要中國同日本能夠親善，日本國民就應該首先提倡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些道理。經過了在神戶五日公開演講，和個人談話之後，日本全國的輿論，對於大元帥的主張，可以說是是一致的歡迎，和一致的贊同。大元帥得到了這種結果，精神上自然更覺得愉快，就容貌上觀察，不但是沒有病象，並見得更現精神。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起程，坐北嶺丸向天津出發的那一天，早晨送行的人數，也總有四五千，大元帥還在船頭上和他們個個人講話。十二月一日清晨便在船頭上修改昌穀所記的在日本各地之演說詞。及船抵門司以後，除接見各普通新聞記者以外，還同一個日本舊朋友，講許多閑話。因為那個朋友是一個帶兵的武官，並且駐紮過西伯利亞的，稍為知道一點俄國情形。大元帥便過去向他探聆俄國的近況，及研究新經濟政策的利害。離開門司以後，當日船行還是很平穩，祇有十二月二日三日，船渡黑水洋的時候就遇到很大的風浪。船身本

來很小，不過兩千多噸，所以我們同行的人們，除了戴季陶君以外，多是暈船得不得了的，都不能夠進飲食。當時大元帥雖是不大暈船，但是也就像有一點疲倦的樣子。并且由上海繞到日本往天津沿途都沒有帶廚子。那十幾天之間，總是吃日本飯，味道既不適口，滋養成份又不多。所以渡過黑水洋之後，三日早晨，我一到餐廳，偶見大元帥，便注意到他的面上顏色不大好。我當時請問大元帥說，『先生今天覺得舒服嗎？不暈船嗎？』大元帥諭曰：『我覺得很舒服呀！』我在當時，還以為是暫時受風波勞動的結果，還以為不大要緊。及四日晨，就到了天津的大沽口，氣候更覺得寒冷了，就有幾位同志，乘小船來報告各方的情況。大元帥還在餐廳中接見那些同志，有極長時間的談話。他面上的氣色，還是和頭日一樣，毫沒有變好。是日正午，就到了天津碼頭。在碼頭附近歡迎的民衆，總有一兩萬人，大元帥站在船頭上和那些同志揭帽相見。站立的時間是很久，當時氣候更是非常的寒冷。及上船抵天津張園以後，我在張園內便留神到大元帥見客攝影，面上表現的顏色，更是不好了。到進午餐以後，大元帥還提起精神到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在大元帥的始意，不過是答謝張作霖的歡迎，稍說幾句客氣話，就可以回來。那知道張作霖一見面，便打開話匣子，侃侃而談，接連的不斷，一談就談了兩個多鐘頭，大元帥是在下午三點多鐘去的，回到張園，已是五點多鐘了。張園往返河北曹家花園，沿途經過的時間，總要半個多鐘頭，大家知道大元帥這幾年以來，都是怕冷的。就是在廣東過冬天，房內也要燒火，也要房內溫度在華氏七十幾度以上。在近幾年中，總沒有受過大寒冷的。這次初到天津，已經是受過了大風波的勞動，毫沒有休息。又由張園往返河北，經過這麼久的寒冷氣候，自然是難受，所以由河北回到張園之先，沿途便覺得不大舒服。一到張園以後，身體就是發冷發熱，生出感冒來了，肝也覺得痛苦了。病症的來勢，似乎是很猛烈的。所以大元帥一定要休息。一方面辭卻晚間的歡迎宴會，一方面更請一位德國醫生，叫做石密德的來診視。其實大元帥的病症，除了臨時感冒以外，肝上的本病，也是同時大爆發了。不過那位石密德醫生，不知道大元帥的病源，故沒有太注意到肝病。以為只是臨時感冒，服藥休

息，經過二十四小時，就可以痊癒的。那知道從十二月四日那晚起，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休息之後，再經過了幾個二十四小時的休息，總是不愈。大概有了十多日的調養，感冒病的確是好了，肝病已緩和下來了。到十二月十八日，北京政府派兩個代表來歡迎大元帥，從速晉京。他們到大元帥床前，報告北京的近況，忽然談到外交問題。大元帥知道段祺瑞，送了一封公文，到各國公使，說是現在臨時政府，一定是尊重歷年條約的，請各國不要耽心罷！所以大元帥就動了感情，便聲色俱厲的對那兩個代表說：『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爲除那些條約，將來中國國民覺悟了，知道太不公平，爲什麼還要來歡迎我呢？』因爲大元帥動了這次感情，所以從這一天以後，肝病便更行爆發，全肝越腫越硬，而且越發增加痛苦。體溫雖然是像健康人差不多，但是脈博總是很快，有的時候每分鐘到一百二十以上，石密德醫生既沒有治法，而且在張園的起居設備，又不大完全，所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便決定三十一日晉京療養。初到京是住在北京飯店，請過了六七個外國醫生來考察商議過。那些醫生都知道是肝病，至於究竟是那一種肝病，都不敢斷定。便由大元帥指定一位德國醫生，叫做克利的來負責診治。克利每日都要到北京飯店去診視一兩次，有的時候也請俄國醫生去供參考。凡是治肝病的藥方，都試驗過了，都是沒有效驗。在一月二十日以前，病況雖然沒有進步，但是體溫升降還不大，差不多都是一律的。所以他的神思還是極清楚，精神還是極好。每日雖然是遵照醫生的囑咐，不見客不講話，但是有時還是用腦力、思想應付時局的辦法。譬如當時最大的時局問題，就是本黨是否加入善後會議。因爲善後會議不久就要開會，所以本黨是否加入的態度，應該要趕早決定。爲這個問題，有許多人和大元帥研究過，總是主張加入的多。後來大元帥看見執政府的措置，一天不如一天，全國稍爲自愛的份子，都是表示不加入。所表示加入的不是軍閥土匪，就是官僚和主張帝制的復辟黨。大家知道後來做善後會議的議長，不是趙爾巽嗎？他是什麼人呢？大家稍爲想想他個人的歷史。他在滿清政府，不是東三省的總督，

前清的大臣嗎？他在民國初年，不是幫袁世凱的忙，後來變成洪憲的功臣嗎？這還不足為奇，最奇的是在最近幾個月管理中管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檢查清室中的機要文件，查得趙爾巽在這十幾年中，每月對於宣統皇帝，都上得有奏摺。直到去年九月止，宣統皇帝出了宮，才不看見他的奏摺了。他在每次的奏摺中，上款自然是寫甚麼『皇帝陛下』『恭摺仰祈聖鑒事』那些話，是不待說了。至於下款總是恭恭敬敬的寫著『臣趙爾巽』或『奴才趙爾巽』幾個字。至於其中說的是什麼話，不必研究，自然可以知道了。像去年九月還向清室稱臣或奴才的人，這是不是主張帝制的復辟黨呢？這是不是清朝的遺民呢？以清皇的遺民，怎麼樣可以做民國議會的議長呢。段祺瑞這次上台，破題兒的第一個會議，偏偏就要借重那一種人，偏偏還要把他拱到高高在上。我們不問段祺瑞的居心是怎麼樣，祇研究他這個善後的會議，究竟是一種什麼樣性質的會議。像用趙爾巽做議長的會議，是不是民國改成帝國主義的會議呢？像含有這種主義的會議，本黨怎麼可以去加入呢？所以大元帥便決計表示不加入。大元帥一面表示不加入善後會議，一面還是計劃開國民會議，求和平統一的辦法，他見到中國之所以不能開成國民會議，來和平統一，就是由於軍隊太多，軍閥作梗。所以要和平統一，根本上還是要裁兵。要裁兵就要有錢，所以大元帥便在那個時候，想出了一個籌錢的辦法。他在沒有想到這個辦法之先，見到了中國現在之所以沒有錢，就是由於每年所還的外債太多。如果要是十年不還外債，把十年所還的外債，展期到十年以後，中國和平統一了才還。那麼在這十年之中，便可以籌得一大批錢。這批錢的總數，要在十二萬萬以上。用這十二萬萬錢來化兵為工，不愁軍士沒有餉，不愁將官沒有俸。到了軍官將士都能夠得錢，一定是不反對這種計劃的，一定是很贊成這種計劃的。至於

他這種緩還外債的主張，毫不損失國家權利。對於國家權利，只有益無損，全國國民更當然是一致贊成的。到了全國軍隊和民衆都贊成了他的主張，他就有權同外國人交涉，不愁外國人不贊成。而且用這種錢來化兵為工，和平統一，在中國的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商業得以興盛。到了那個時候，外國在中

國的商業，決不致受像現在這一樣的影響，他們的商業，就可以大發達，就可以得大利益。

他們都是外國很聰明的人，一想到這地，自然也是樂得贊成的。到了中外都贊成他的主張，他就可以實行化兵爲工，和平統一，來開國民會議，解決其餘的各問題。大元帥在北京飯店，已經是想好了這種種計劃，祇要等到身體一好，就可以次第推行。那裡知道從一月二十日以後，體溫的升降，更是非常大。有的時候，升到攝氏四十一度多，有的時候降到二十七度。時升時降，前後日的差數，都是很大。到了二十四五那兩日，大元帥簡直不能進飲食，一食就要作嘔，似乎是很辛苦的。體溫既是很高，脈搏也是很多，各國醫生都主張搬到醫院，去施用手術診治，以救此危急之症。二十六日上午，經過了醫生家屬和各同志的協商，復請求得大元帥的允許，便於是日下午三時，搬到協和醫院。一到醫院以後，或者是由於沿途振動的關係，體溫脈搏，更是加高，面貌與眼珠，時時刻刻改變，越變越黃。各醫生都斷定病症，到了很緊急的時候，非即刻施行手術不可。所以當時請得大元帥和家屬的同意，於是日下午六時半施行解剖手術。各醫生於解剖之後，用肉眼觀察，就知道全肝已是堅硬如木，完全是肝癌，成了無法可治之症。便一面取肝上之三極微部分作試驗品，一面洗淨肝臟，用綁帶縫上。當晚德美醫生在協和醫院用顯微鏡試驗所取出之品，究屬何症。另外有一位俄國醫生，便向幾位重要同志報告大元帥之病況。那位俄國醫生，沒有負診病的責任，祇是本黨特別聘請來考察大元帥的病症的，他當解剖的時候，也是臨場。出解剖場以後，對幾位重要同志秘密報告說：「孫先生病症的起源，遠因在十年以上，近因也有兩三年之久。這種病的發生，是一種寄生的微生物。初長於腸中，再播於肺，以及於肝。到了肝上，一變成癌症，那麼在外國新科學上療治之術，就算是山窮水盡了。至於此微生物之來源有兩種，一種是由於花柳病而生，一種是由於居住熱帶地方飲食呼吸而生。但是試驗孫先生的血液，毫不表現有花柳毒之痕跡，可見是由於居住熱帶地方飲食呼吸而來，沒有疑義。孫先生經過今日解剖之後，各醫生用肉眼觀察，大概都說是肝癌。究竟是否的確，現在正用顯微鏡考察中。如果真是肝癌，便極少挽救的方

法了。』那位俄國醫生報告完了之後。聆聽的各位同志，沒有一個不是很悲傷的了。到二十七日上午，由於顯微鏡所考察的證明，都斷定大元帥的病症，是肝癌了，西醫已經是宣佈是九百九十分的絕望了。在最近科學中有用雷療治之試驗，這種試驗也沒有什麼把握，只算是千分之一的希望罷了。但是用雷療，必須等到解剖傷口痊癒，病人身體稍為復原以後，才可以試驗。所以從一月二十七日以後，我們一線的希望，就是想解剖傷口速癒，再用雷療治療。到了二月初日，傷口痊癒，完全是滿足了我們的希望。大元帥以後就分日用雷療治。據醫學上的試驗，如果用雷療治此病，過了五十點鐘，還沒有效果，那就是完全絕望了。及二月十五六日，用電療治，已經有了四十四五點鐘了，對於病症，除了稍為減少痛苦而外，根本上沒有一點功效。大元帥至此，也知道外國醫學，對於他的病症，沒有辦法了。於是家屬和許多同志，為盡人事計，就建議於大元帥極力勸用中醫療治。大元帥為安慰家屬和各同志起見，也不十分拒絕。便於二月十八日，由協和醫院搬到鐵獅子胡同行轅，改用中醫療治。初次還是想治本，服黃耆黨蔘等類補氣之藥。以後祇是想治標，服排水消腫之藥。無論是治標治本，也都是沒有功效。到了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有一位看護婦表現極急忙的樣子，出病房來對家屬和各同志說：『今天早晨孫先生的態度忽然由極勇敢的而變為極為慈善的。這兩天以來，喉中含痰極多，今天下午尤甚，而且神思又不十分清楚。依我的經驗看，恐怕孫先生已經是到了極危險的時候了。你們諸位有甚麼話要向孫先生請示的，現在恐怕是已經到了時候了。』因為以前我們大家都知道大元帥的病症是絕望了。所以許多同志極力主張預備一個遺囑，以便到了萬一危急的時候，請示大元帥簽一個字，作本黨永遠遵守的信條。要辦這件事，就付託到汪精衛先生。所以汪先生聆了這位看護婦的話，便約同三位家屬，先請宋夫人出大元帥的病室。他們那四個人就進病室內去，關上房門，站在大元帥病床之旁當時大元帥正在昏迷，似睡未睡之中，聽到有人聲進來，便驚醒了。打開眼來一望，向同志們說：『你們有甚麼事呢？』說後又把眼閉了，汪先生說：『我們四個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資格，來看總理的病況的，總理的

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過好了之後，必須長時間的調養。在調養的時期之中，本黨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夠停滯的，一定要有同志代總理去執行黨務才好。要有同志能夠代為執行黨務，合乎總理的意見，沒有錯誤，一定要總理先說幾句話，讓各位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呢？」大元帥對於汪先生的說話，很像是聚精會神的聆。聆完了之後，似乎是有有一種深思遠慮的態度，有許多話都要說的樣子。但是沈靜了許久，方打開眼來莊嚴的諭曰：『我沒有甚麼話要說呵！我的病如果是好了，有許多話說不完。我就搬到湯山去休養，費幾日的功夫，詳細的分別對你們說。我的病如果是不能好，還有甚麼話可以說呢？』大元帥說完之後，又閉起眼來。汪先生再請求說：『看我們總理的病，一定是可以好的。不過在沒有完全好之先，恐怕調養的時間太久，不能夠理事務。而本黨的事務，現在又是很忙，又不能夠停滯。所以還是希望總理早說幾句話，讓我們能夠遵守，照那些話去進行黨務才好呢？』大元帥沈靜了許久，再打開眼來諭曰：『我看你們是很危險的呵！我如果是死了，敵人是一定要來軟化你們的。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軟化，敵人一定是要加害於你們的。你們如果要避去敵人的危險，就是一定要被人軟化。那麼我又有甚麼話可說呢？』說完了這一段話之後，又再閉起眼來。汪先生使用極誠懇的態度請求說：『我們跟總理奮鬥了幾十年，向來都沒有怕過危險，以後還怕甚麼危險呢？向來沒有被敵人軟化過，以後還有甚麼敵人能夠軟化我們呢？不過總是要總理先告訴我們幾句話，令我們有所遵守，方知道怎麼樣向前去奮鬥呢？』大元帥看見他們的請求，是這樣的懇切，便再打開眼來諭曰：『你們要我說甚麼話呢？』汪先生答曰：『我們現在預備好了幾句話，讀到總理聆。總理如果是贊成的，便請總理簽個字，當做總理所說的話。總理如果是不贊成的，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為筆記下來，也是一樣。』總理聆到這地，便立時諭曰：『好呀！你們預備了甚麼話呢！念到我聆吧！』汪先生便馬上拿出頭一張字來，低聲慢讀曰。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

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大元帥在這一張字讀完之後，便表示極滿意的態度，點頭諭曰：『好呀！我很贊成呀！立時又有一位家屬繼續請求說：『先生對於黨務，既是贊成說幾句話，對於家屬可不可以照這個樣子，也說幾句話呢？』大元帥諭曰：『可以呀！你們要說甚麼話呢？』汪先生又照頭次的樣子，拿出第二張字來讀曰。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大元帥聆完了這張字後，又點頭諭曰：『好呀！我也很贊成呀！』汪先生更請求說『總理既是很贊成這兩張字，今日可以不可以就簽一個名，當做總理自己說的話一樣呢？』大元帥點頭諭曰：『可以呀！』於是汪先生便打開門，出去拿筆來。宋夫人坐在門口的大客堂中，看見病室的房門一開，便立時走進去了。大元帥看見夫人進來了，似乎是要免去勸夫人對於病人絕望的感情，所以立刻諭汪先生曰：『今天不要簽字，過幾日再看罷！』他們那四個人，祇得遵照大元帥的命令，不敢再請求簽名了。依次從病室中走出來，等大元帥去休息了。因為這個情形，所以我們所得的那兩張遺囑，二月二十四日還祇做過一半工夫，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簽名。從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因為大元帥的體魄健勇氣大，又延長了十多日。不過每日的肝腫愈發加大，身體更是一日比一日的衰弱。飲食進身體去的食物水分，都不能夠排洩出來。以後也不多思飲食。全身的浮腫，更是一日比一日的增加。家屬和各位同志，把治標的責任，始終還是請克利醫生擔任。至於治本的希望，也還是沒有放棄。所以又請得了一個留學日本的山東王綸醫生，用日本新發明治肺癰的藥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據說要注射五次以後，這種藥水對於病症有沒有功效，才可以知道。及注射到第四次和第五次，大元帥也覺頗有功效，以後又再注射了兩次。病

人的腹水，還是有加無已。王醫生便說藥方雖是對症，但是不能抵抗病勢，便請求停止注射，至此已經是三月九日和十日了，至此正是所謂百藥罔效，群醫束手的時候了。大元帥除不能多進飲食而外。體溫雖然是如常，搏脈更增加得很多，有時候到一百五六十次。呼吸極形減少，有時候只有十八次。然而大元帥的勇氣始終還是很大，態度還是很莊嚴，神思還是很清楚。當時萬念俱消，只有念念不忘於東江的軍事。常問各同志以東江戰事的情形，粵軍進到甚麼地方。各位同志便報告說，粵軍得了潮汕，許總司令蔣校長已經到了汕頭。滇軍得了博羅河源，楊總司令自石龍進駐到博羅去了。胡留守在廣州維持治安，籌餉籌彈接濟各軍，也是很得力的。大元帥聆了這些報告，極表現安慰的樣子。并諭云：『要電告漢民，不可擾亂百姓。』一直到三月十一日正午以後，大元帥對於各同志和家屬，便吩咐說：『現在要分別你們了。』更要汪精衛先生到床前諭云：『拿前幾日所預備的那兩張字來呀！今日到了簽名的時候了。』汪先生只得將那兩張字呈上，由宋夫人含淚抬起大元帥的手腕執鋼筆簽名。大元帥簽名畢，使用極安靜的態度，召家屬環立左右，一一囑咐後事畢。并諭各同志云：『我這次放棄兩廣來北京，是謀和平統一的。我所主張統一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一個新國家。現在為病所累不能痊癒，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數十年為國民革命所抱定的主義，不能完全實現，這是不能無遺憾的。我很希望各位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現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然是死了，也是很瞑目的。』從此以後呼吸更極艱難，精神疲倦，不能連續的說四五個字以上的話。只有不連不斷的反覆說『和平』『奮鬥』『救中國』那幾句話了。醫生以為病人太辛苦，便請勿言，好自安眠。從十一日下午安眠了以後，在十一日晚六時半，雖然是醒過了一次，手足就變冷了。不能作多言語。到十二日晨約三時許，再醒了一次，更是不能言語了，祇是喘氣不堪。延遲至八點多鐘，克利醫生還來看過一次。及到了九點三十分，大元帥便和世界的人類長辭了，便和一手創造的中華民國永遠分離了，便把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責任，就要我們黨員自己擔負起來了。

諸君想想，我們既是大元帥的黨員和大元帥的主義之信徒，現在大元帥死了，好比是我們死了父親一樣。一個人死了父親，要真是一個明大義的孝子，就要像古語所說的。『所謂孝者是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我們現在都是大元帥的孝子，要盡孝道，就要善述大元帥遺留之事，要善繼大元帥未竟之志，那才是好孝子，那才是真孝子。我們現在要做這種孝子，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呢？究竟是從那裡做起呢？我們要研究這種方法，要知道自那裡做起，就要先知道本黨的力量和本黨的地位。諸君常在廣州，大概還不十分明白本黨在外面是甚麼地位，和甚麼力量。兄弟從前那幾年住在廣州，也是一樣。所謂當局者迷。自這次跟大元帥北上，繞道日本到北京，把沿途所經過的情形一想。初到上海租界之內，那天歡迎的人數總有一兩萬。經過日本的長崎神戶門司各埠的外國歡迎人數，每次都是幾千的。後來一抵天津，軍政界和人民的歡迎，空街空巷，就想發狂一樣。當日全市的人數總有四五萬。晉北京的那一日，在前門車站一帶來歡迎的軍政界，以及普通民衆，原來據說有二十萬。後來因為被段祺瑞限制了，也還有十多萬人。諸君想想，各地的民衆這樣的來歡迎本黨的總理，是爲甚麼呢？有甚麼力量能夠到處令這麼多的民衆來歡迎呢？簡單的說，就是爲本黨的三民主義，因爲本黨有三民主義的力量，所以就能夠令他們都來歡迎。他們來歡迎本黨的總理，就是來歡迎本黨的三民主義。歡迎本黨的三民主義，那不是歡迎本黨呢？所以兄弟每到一城市，遇著了新朋友，他們總是發相同的疑問說：『先生是來自廣州的嗎？外間抱帝國主義的人，從前雖然是造許多的謠言，反對你們廣州，反對你們的政府。但是你們在這幾年中，打破一切艱難困苦。你們的軍隊，真是勇敢善戰呵！你們的國民黨，真是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呵。現在貴黨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完全用人民爲主體，和那段祺瑞所召集的甚麼善後會議，完全代表一般官僚軍閥和土匪，真是有天壤之別呢？』單就他們這樣公開的熱烈歡迎，和個人誠懇的親善，就可知道本黨在外間的地位和力量了。我們再就這次大元帥死後追悼的現象想一想。諸君每日看報紙，大概都是很留心外國新聞的，我們先想想俄國的追悼情形。試問俄國的通國政府和民衆，是不是用極誠懇的

文字和儀式，來追悼大元帥呢？是不是用極誠懇的態度，來表同情於本黨的主義呢？又是不是以極誠懇的意志，來希望本黨遵照大元帥的遺囑，努力向前去奮鬥呢？推想到德國政府同人民，追悼大元帥和表同情於本黨的情形，又是否同俄國一樣呢？他們兩國都是一樣的。再推想到持帝國主義的國家，最近像日本，遠一點像美國，更遠一點像英國法國，他們政府所持的主義，雖然是和本黨相反，不表同情於本黨，不是熱烈的追悼大元帥。但是他們那些國家的人民，真是主張公道的仁人志士，又是不是像德國的民衆，那一樣的誠懇在追悼大元帥和表同情於本黨呢？更想到那些被壓迫的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像比利時埃及印度阿美利亞以及南洋群島，都是不是像德國俄國的民衆那一樣的誠懇在追悼大元帥和表同情於本黨呢？簡而言之，都是一樣的。由此便可見本黨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國際上的力量。我們再想想國內的情況，又是怎麼呢？追悼大元帥最哀痛的地方，除了廣州以外莫過於北京。北方民衆這次費很大的犧牲和熱心，才能夠把大元帥歡迎進京去。預想進了北京以後，便幫助大元帥，計劃一個中央革命，以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從頭再來建設一個新民國。孰料大元帥到天津就病，晉京以後，總是病而不起，並且日加重一日，始終沒有公開的和他們見一面所以大元帥在北京逝世了之後，那些民衆哀痛的情形，恐怕還要過於我們廣東。譬如一聽到說大元帥逝世的信息。他們不待政府的通知，就自由舉哀。除了日日結隊往鐵獅子胡同行轅和中央公園弔唁以外，並且用種種文字和宣傳，來表示他們哀痛的心理，最奇怪的的是大元帥的靈柩由協和醫院移到中央公園的那一天，十幾萬民衆恭迎於協和醫院之前，有無數萬人們，祇求一個執紼而不可得。再由中央公園出殯到西山的那一天，三十多萬民衆，由中央公園步送到西直門，還有一兩萬人更由西直門步送到西山，絲毫不現有勉強和疲倦的樣子。試問諸君，此中有甚麼力量，能夠令這麼多民衆舉行這樣狂烈的運動呢？是不是由於大元帥生前奮鬥的精神，以及本黨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原動力呢？我想除了這個原因以外，再沒有第二個道理。除了北京以外，就是推到各省會各城市以及各特別區域。在這一箇多月之中，沒有一處不是民衆自由舉哀的。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民衆

自由開會追悼的。沒有那一個追悼會的人數，不是幾千幾萬的。好像最近在長沙省教育會舉行的湖南全省追悼會和在濟南華北運動會中舉行的山東全省追悼會，每日到會的民衆，總是在十萬以上，或者是整隊出街遊行，或者是在大會場中設臺講演，總是行很劇烈的示威運動，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宣誓遵守大元帥遺囑，努力國民革命，以竟大元帥未竟之志。就是推到各省的軍政界，像洛陽的建國豫軍三萬多人，大元帥逝世的電報一到，便舉哀三個星期。國民軍全體二十幾萬人，舉哀一個星期。其他奉軍和各省軍政界，有的是舉哀七日，有的是舉哀五日，最短也是三日，最令人奇怪的，是向來反對本黨的直系軍閥，像蕭耀南孫傳芳那般人，和歷年反叛本黨的聯治派，像趙恆惕唐繼堯那些人。也要開會設壇致祭，也說些甚麼遵照孫先生的遺囑，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由此就可知本黨在國內所處的地位和所有的潛勢力了。總而言之，本黨的總理孫大元帥雖然是不幸逝世了，但本黨的主義，是到處有人崇拜的，到處有人歡迎的。人人都崇拜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義，就是人心都歸化了本黨。就是本黨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潛勢力。本黨在政治上有這樣高的地位和這樣大的勢力，就是本黨在政治上一方面的財產很豐富。好像一個極有錢的美國摩爾根銀行一樣。簡而言之，這就是本黨很有錢。因爲本黨在無形之中很有錢，所以中國國民黨這五個字，現在就是一塊金字招牌。青天白日滿地紅這種新國旗的價值，就是像你們滇軍的紅邊軍帽一樣。大元帥生前在廣東，雖然是很窮，沒有多錢發給你們的軍餉，但是死了之後，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分散在各省各國是很豐富的。這種豐富的政治遺產，是不可以數量來計算的。因爲本黨的財產有這樣的豐富，本黨的招牌有這樣的值錢，所以一般向來反對本黨的北洋軍閥，日夜都是不安，要想方法勾結本黨的敗類，來破壞本黨，來搶本黨的錢。一般反叛本黨的聯治派，現在也說甚麼聯治主義是和三民主義相通的，也是日夜在想方法要聯絡本黨的敗類，假冒本黨的招牌，圖他們升官發財的私利。像貴省的唐繼堯就是這一種人。他一面在雲南通電，說要遵照大元帥的遺囑，來追悼大元帥，一面派人到處勾結反對本黨的勢力，來破壞本黨政府。又一面派兵到廣西來打

仗，要消滅本黨的建國軍。諸君正是今天畢業的軍人，都是學識很豐富的分，像這種種是非，應該是要知道很清楚的。諸君自今天畢業之後，實行楊總司令的訓詞，遵照大元帥的遺囑，去努力國民革命，要所做的革命事業不錯，根本上一定要徹底明白這種是非。明白了這種是非之後，究竟是用甚麼方法去實行大元帥的遺囑呢？簡單的說，用諸位軍人的能力，就是要用軍事的力量，去打倒從前反對大元帥的惡勢力。從前反對大元帥的惡勢力，在西南就是聯治派，在北方就是賣國的官僚軍閥，在全世界就是帝國主義。諸君要達到最後的目的，去打倒帝國主義，首先就要打倒貴省的唐繼堯，和他所勾結的聯治派。再打北洋派的賣國軍閥。打倒了他們這幾個勢力，國內便不致再有人敢受帝國主義的利用。在中國橫行的帝國主義，便可以根本推翻。我們便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然後我們才可以開國民會議，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要達到這種種大目的，擔負這個責任的人，就是你們新畢業的和有智識的革命軍人。諸君在這個幹部學校畢業，都是受過了很好的精神，從前也是聽過了大元帥的演說，跟隨了大元帥努力革命過的。要已往所做的革命事業，不致半途而廢，要把大元帥的遺囑，完全實行。奮鬥的簡單方法，就是遵守楊總司令的訓詞去消滅從前反對大元帥的那些惡勢力。大元帥的主義，現在雖然是到處有人歡迎，但是中途還有不少的障礙。因為有了不少的障礙，所以大元帥留下來的主義，在事實上還不能夠實行。我們能夠實行大元帥的主義，首先就要除去那些惡勢力的障礙。諸君擔負了實行這種主義的責任，如果那些惡勢力的障礙，一天沒有除去，這就是諸君的革命努力一天不能夠停止。兄弟今天有這個機會，能夠代表胡留守，來參加貴校的第二次畢業盛典。沒有別的好話可以貢獻到諸君。只有引大元帥的兩句訓詞，來希望諸君。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附 錄

此演說詞發表後，頗聞有二三同志議論。謂據此所述，則總理遺囑為秘書擬稿，而非總理親撰，未

必爲總理真意所在云云。此等議論，殊無辨駁之價值。蓋無論何人擬稿，苟經主其事者親筆簽名之後，則非復擬稿者之意思，而爲簽名者之意思，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更就總理生前辦事言之，總理在大總統大元帥任內，在總理任內，一切重要命令，有由總理親自創稿者，有由秘書擬稿者。總理對於擬稿，有時一字不改，有時斟酌再三，有時另擬，不厭求詳。而既經一度簽名之後，即爲總理之意思。從未有對於總理命令，而分別其爲總理親自創稿，抑命人擬稿者。以其性質與效力，完全相同，無須分別，亦無容分別也。遺囑固由汪先生擬稿而於二月二十四日，既經逐字逐句朗讀於總理之前，總理聽畢之後，完全滿意。再經十餘日之詳細考慮，始於三月十一日，取出原稿，總理親筆簽名。此實與總理平日在政府及黨部所發重要命令，同一形式，同一手續，毫無可以發生疑問之餘地。此等常識，本無須討論，特以其有關同志對於總理遺囑之信仰，故辨其惑如此。

黃昌毅謹跋五月廿三日